

【学林人物】

学史求真 学理求通

——李运富教授学术述略

何余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 李运富教授长期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科研和古文献的整理、释读工作,他坚持“学史求真,学理求通”的学术理念,不泥陈说,实事求是,在汉字学、训诂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广泛领域,围绕学术的“史”与“理”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方法。本文试就李运富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特点做简要介绍。

关键词 李运富;学史求真;学理求通;汉字学;训诂学;词汇学

中图分类号 H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725(2017)06-0022-10

收稿日期 2017-03-20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3&ZD129);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3AYY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何余华(1989-),男,江西新余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李运富教授(下文省“教授”二字,称引其他学者亦免“先生”等),1957年生,湖南衡阳人。1988年湖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93年破格晋升副教授。同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毕业留校任教,1998年破格晋升教授,2000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2014年成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晋升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2002年3月至2003年3月在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任客座教授。先后担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轮值),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所和古代汉语研究所所长,《励耘语言学刊》(CSSCI)主编,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科研和古文献的整理、释读工作,出版有《汉字学新论》《汉字职用研究·理论与应用》《汉字职用研究·使用现

象考察》《汉字汉语论稿》《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汉字构形原理与中小学汉字教学》《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等各种著作、教材、工具书和古籍整理作品20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语文》《世界汉语教学》《语言科学》及《中国语文通讯》(香港)、《中国出土文献研究》(日本)、《世界汉字通报》(韩国)、《愿海》(新加坡)等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16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等20多项,荣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北京市第十三届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二届语言文字应用研究青年优秀论文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等多项奖励。主要社会兼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国务院法制办立法用语咨询专家,全国人大立法用语规范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院校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

科院语言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学会理事,北京市社科规划办评审专家,《古汉语研究》等多家刊物编委。国际学术兼职:韩国中语中文学会海外编委,世界汉字学会中国理事,《世界汉字通报》(英文)及《汉字研究》(韩国)编委,日本“中国出土文献研究会”会员等。

李运富在《汉语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原则》(2010)中将学术研究区分为学理和学史两种类型。学理指某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学科应有的论题和内容,以及相关的概念、术语、类别、规律、体系等。学史指某门学科的研究历史,即已经产生的研究者、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成果和研究流派等。学理是开放性的,需要不断探求和完善,学史是封闭型的,已经产生的学术研究事实无法改变。研究学理的目的是为了分析现象,解释问题,建立学科系统。研究学史的目的是为了清理家底,奠定基础,以便在新的学术研究中吸收已有成果,借鉴历史经验,从而更好地研究学理。李运富认为这两种学术研究要遵循不同的原则“学史求真,学理求通”。他自己正是这样践行的。

一、实事求是,学史还其真

研究学术史是从事一切学术研究工作的基础。对于前人研究的有无、原文原意是什么、如何评价等,都应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进行论述。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汉语言文字学的学术史研究中,有的无中生有、以偏概全、张冠李戴,有的以今律古、强人就己、误解或篡改古人原意,有的主观评议、人为拔高或贬低,致使产生不少偏见和错误,有的甚至以讹传讹,形成共识。李运富反对随意构拟学术史,主张学术史研究要从文本原意、原举实例和学术背景出发,“求真有、求真意、求真评”,由此使得学术史上许多被误解的理论和事实得以澄清。

(一) 训诂学史方面

训诂学是传统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产

生过许多跟文献解读相关的概念和术语,有些被现代人长期误解。例如将古代的“联绵字”“连语”等同于现代“复音单纯词”,认为王念孙“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讲的就是单纯词的特征。李运富发表《“离黄”及相关语词考——“联绵词”性质略辨》(1987)《是误解不是“挪用”——也谈古今联绵字观念上的差异》(1991)《王念孙父子的“连语”观及其训解实践》(1990/1991)等论文,对这几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和种种误解的来龙去脉进行详尽梳理和辨正,指出古人的“联绵字”是与“单字”相对立的复字概念,包括现代意义的部分合成词和复音单纯词;“连语”则是同义并列复合词或同义词连用,王念孙“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意谓连语由两个意义相同的语素或词构成,不能将同义语素或同义词分别训解为不同的意义。所以王念孙的“连语”不等于传统的“联绵字”,而传统的“联绵字”也不等于今天的“复音单纯词”,它们是处于不同体系中的不同概念,但古人分析“联绵字”“连语”事实时,大都从训诂需要出发,选用词形与词义关系不太透明因而易于误解的词例,今人遂误认为这些词都是字面不表义的单纯词,并将“联绵字”改称为“联绵词”,进而以单纯的联绵词观念批评王国维《联绵字谱》和符定一《联绵字典》收词不纯。李运富认为这种以今律古、强人就己的研究思路不符合“学史求真”的原则,应该按照古人的原意来理解作为学术史概念的“联绵字”和“连语”。沈怀兴《联绵字理论问题研究》^[1]《现代联绵字理论负面影响研究》^[2]高度评价并完全采纳了李运富的观点。《中国大百科全书》邀请李运富撰写“连语”“联绵字”“《联绵字谱》”“《联绵字典》”等条目,其结论已得到权威辞书认可。

传统语言学与“连语”相关的还有“连文”“连言”“复语”“复文”“兼言”“并及”“连类而及”和“并言”“并称”“省文”“省言”等说法,今人一般不加区分,统称为“连类而及”,并等同于现代的“偏义复词”。李运富

认为这也是不顾辞例事实和古人原意而产生的误解,所以在《论意域项的赘举、偏举与复举》(1998)中对以上术语反映的语言现象仔细离析甄别,根据其辞例性质的不同分成异意域相关信息项的赘举、同意域相关信息项的偏举、同意域相同信息项的复举三类,同时辨析传统术语与三类现象的关系(“并及”“连类而及”“兼言”属第一类,“并言”“并称”“省文”“省言”属第二类,“连语”“连文”“连言”“复语”“复文”属第三类)。这不仅使模糊错综的传统术语得到清理,也使古典文献中复杂的语言现象得到合理解释,颇有正本清源之功。

“古今字”原本是传统训诂学概念,用于指出不同时代记录同一词项而分别使用的不同字符,但后来被偷换改造成文字学意义上的概念,通常将“古今字”等同于“分化字”,认为古今字是为了区别记录功能而以原来的某个多功能字为基础分化出新字的现象。李运富《早期有关“古今字”的表述用语及材料辨析》(2007)、《论王筠“分别文、累增字”的理论背景与研究意图》(2012)、《从“分别文、累增字”与“古今字”的关系看后人对这些术语的误解》(2013)等文对“古今字”学术史溯源溯流,澄清了今人许多错误认识,引发系列相关概念的重新定位。李运富对“古今字”学术史的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的支持,作为项目成果的《历代注列“古今字”字组汇编》和《“古今字”学术史丛书》将为“古今字”的百年争议画上句号。

(二) 文字学史方面

在文字学史上,“六书”长期被看作六种造字方法或六种结构类型,由此引起相关汉字理论研究,产生“六书学”。李运富认为“六书学”不等于“六书”,“六书学”大都是后世学者对“六书”的借题发挥或误解,未必符合“六书”原意。他发表《〈说文解字〉的析字方法和结构类型非“六书”说》(2011)、《“六书”性质及价值的重新认识》(2012)、《〈说文解字〉“含形字”分析》(2009)、《〈说文解字〉“从某字”分析》(2012)等文,多角

度论证“六书”不是汉字构造的方法类系,也不是《说文解字》的析字方法和结构类型,指出“六书”的性质应该属于古代小学教育中的一门教学科目,“六书”之名是对该科目知识内容的概称,具体内容涉及汉字的形体来源、构件功能、类聚关系、用字法则等,构成汉字基础知识的教学体系,而不是单一理论的类型系统。至于《说文解字》的析字方法,李运富认为有“构件功能分析”“部件同形分析”和“形体变异分析”三种,跟“六书”不完全对应。李运富的系列论述,或许能够还原“六书”本义,并理顺跟《说文解字》的关系。

宋代郑樵提出“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认为许慎的“文”“字”之分就是“独体”“合体”之分,这种观念今日已成学界共识,但李运富《汉字“独体”“合体”论》(2015)及《“形声相益”新解与“文”“字”关系辨正》(2017)指出,这是对许慎“文”“字”观念的误解,许慎把最初“依类象形”而产生的符号叫做“文”,后来“形声相益”而产生的符号叫做“字”,是就构字取形的方法或造字途径而言,并非针对汉字结构所作的分类。从宋至今,大家都按“独体”“合体”来分析汉字的结构类型,但“独体”“合体”的“体”指什么一直没有明确定义,只是跟“六书”的前四书进行简单对应,即“独体=象形+指事”,“合体=会意+形声”,可“六书”本来也不是结构类型,结果导致每个人提取出来的“独体字”都不一样,甚至出现“准独体字”“合体象形字”等自相矛盾的说法。李运富认为要分独体、合体的话,这个“体”应该指汉字的结构单位——构件,那么只有一个构件的字就是独体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构件合成的字就是合体字。至于“文”与“字”的关系,李运富认为首先要正确理解“形声相益”的含义,“形声相益”并非“形符、声符相加合”之意,因为训诂上讲不通。根据“形声”具有动宾结构用法和“取譬相成”的互证,“形声相益”应该理解为“形化语言以益象形”,就是在象形造“文”方法基础上增加音义造“字”方法,以突破客观事物局限,达到大量滋生汉

字的目的。因此“文”与“字”的区分不在于“独体”“合体”结构的不同,而在于构字取形的途径和方法不同。

类似的经典学案还有很多。如有人根据章太炎黄侃对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字的质疑或不够积极,断定章黄不相信甲骨金文,思想保守,反对新生事物,阻碍学术进步。李运富《章太炎黄侃先生的文字学研究》(2004)认为此评价有失公允,忽略了章黄提出质疑的出发点,也无视章黄前后态度的转变,更没有根据当时的整个学术背景和章黄的实际学术活动来分析。事实上章黄质疑的是假材料,反对的是个别学者凭借新材料招摇炫世,主张以传世正统文献为根底,合理利用出土新材料,黄侃先生对《说文解字》的批注就多次引用甲骨金文等古文字材料。何九盈看到这篇文章后写信给李运富说“关于黄侃,你的看法很正确。……对章黄的正确评价,需要时间,也需要传人。”近来学者全面考察了章黄的有关论述,验证李运富的看法是客观的。

(三) 修辞学史方面

李运富对修辞学史的研究除发表过系列综述类文章和书评外,主要成果是专著《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1992),这本书得到许多修辞学大家的高度评价。如袁晖(2002)认为“这是一部特色鲜明、学术性强、信息量大的修辞学史著作”,“这样完善的系统,其科学性和信息量都会有可靠的保证的”,“论文资料的详实与取材的广泛,在同类著作中是空前的”。^[4]宗廷虎(2007)评价说“《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是一部综述性修辞学史,它对20世纪中近90年的修辞学研究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对修辞学的每一方面既进行历时的研究追踪,也进行共时的成果评介;在对修辞学家和修辞学著作评介时,既进行研究内容和方法的介绍,也进行成绩和不足的评论。所以,该书既有着较明晰的史的轨迹,也有着较高的学术品格。同时,该书占有材料非常丰富,不仅穷尽式地介绍修辞学著作,而且尽可能多地列举修辞学论文,可以

说是一本材料与见识结合得较好的史学著作。”^[5]王希杰(2008)评论李著是“一本有独立见解的修辞学史著作,同样体现了杨树达以来严谨的学风”。^[6]此外还有郭焰坤《一部独具特色的现代修辞学史——评〈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7]、周守晋《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与修辞学的二十世纪——读〈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8]等评论文章。众多专家的赞誉恐怕正是李运富“学史求真”的态度所致。

二、勇于创新,学理求其通

学理研究务求符合逻辑、符合规律、符合科学、符合系统,能够有效地描写现象、阐释规律、推广应用,这是李运富对“学理求通”原则的具体解说。学术的进步,从根本上说就是学理的越来越“通”,新理论新范式的不断建立。李运富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

(一) 汉字学方面

李运富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自觉从“形构用”三维视角分析汉字学的基本理论问题,2005年《汉字语用学论纲》正式提出“形体、结构、职用”是汉字本体的三种基本属性,相应地也是研究汉字的三个基本维度,分别从三个维度着眼研究汉字可形成汉字形体系统、汉字结构系统和汉字职用系统,它们作为三个分支学科共同构成汉字学新体系,这就是“汉字学三平面理论”。2012年出版的《汉字学新论》以“形体、结构、功能”三个平面的汉字本体分析为纲,以“汉字属性、汉字起源、汉字关系、汉字文化”为纬,创建了立足“三个平面”多角度讨论问题的立体式研究思路 and 知识体系新框架。赵家栋(2016)评论说“该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突破传统的‘形音义’研究视角,另辟蹊径,提出了形构用三个平面的汉字研究系统,这一系统的提出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汉字研究存在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为汉字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是汉字学研究理论的一次新突破。”^[9]此外,张道升^[10]、郭敬燕^[11]、付海

燕^[1]、赵一夫^[2]也从不同角度对《汉字学新论》给予高度评价。李运富《“汉字学三平面理论”申论》(2016)进一步论证了“汉字三要素说”的理论缺陷、“汉字三维属性”与“汉字学三个平面”“汉字职用学”是“三个平面”的重点、“汉字学三平面理论”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该理论的思想和方法已经积极地影响到汉字学领域的方方面面,近年来学术界涌现了大批与该理论相关的成果,具体参见何余华《汉字“形构用”三平面研究的回顾与展望》^[3]。

在汉字学的“三个平面”中,李运富特别重视“职用”平面,致力于建构“汉字职用学”分支学科。李运富带领团队成员探索汉字职用理论和考察汉字职用现象的成果已结集出版,分为两册。《汉字职用研究·理论与应用》(2016)包括汉字三平面理论、汉字发展史理论、汉字职用理论、字词关系与字际关系理论,以及对前人有关汉字职用认识的总结评述等,也有少数文章属于学界对上述理论的评述和有意识应用等。《汉字职用研究·使用现象考察》(2016)主要在汉字职用学理论指导下进行字符职能考察、语符用字考察、文本用字考察、个人用字考察、集团用字考察、断代用字考察、用字比较考察等,意在通过文字材料的系统考察,描写用字现象,揭示用字规律,总结用字特点,解释用字成因,反映用字历史。汉字职用的研究主要是字词关系研究,陈斯鹏(2011)评价说“在这方面,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可以说是一个例外,该书对汉语字词关系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另外一位比较重视汉语字词关系研究的文字学家是李运富。”^[4]在“汉字职用学”提出以后,以字词关系考察为核心的汉字职用研究已成为学界的前沿热点,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汉字学三平面理论”之“通”,在于既能化解各种理论争议,又能解释各种文字现象,还能解决各种相关领域的实际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多方面意义。^[5]李运富先后发表的论著很多都是针对具体问题而言,但大都

跟“三个平面理论”相通。如《汉字的形体演变与整理规范》(1997)、《从楚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看战国文字在汉字发展史上的地位》(1997)、《本体·系统·比较——汉字史研究方法论》(1999)、《论汉字职能的演变》(2001)、《现代形声字的判定及“类义符”和“类声符”》(2002)、《论汉字结构的演变》(2007)、《汉字演变的研究应该分为三个系统》(2009)、《“两”字职用演变研究》(2014)等,主要就汉字发展演变的历史问题进行讨论,主张要从汉字本体出发,分形体、结构、职用三个方面各自进行比较,分别描写形体演变史、结构演变史和职用演变史;又如《论汉语字词义关系的表述》(1997)、《论汉字数量的统计原则》(2001)、《论汉字的字际关系》(2002)、《论汉字的记录职能》(2003)、《论出土文本字词关系的考证及表述》(2005)、《关于“异体字”的几个问题》(2006)、《汉字性质综论》(2006)、《论汉字起源的具体所指》(2006)、《汉字的文化阐释》(2012)、《传世文献的改字及其考证》(2016)、《“异体字”研究也要重视“用”——序张青松〈正字通异体字研究〉》(2016)等,也都是围绕三个平面展开的:统计单位汉字的数量、描写汉字之间的关系、讨论汉字的性质、探寻汉字的起源、对汉字进行文化阐释、文献用字现象的分析等,都应该从形体、结构、职用三个维度分别进行,不能把不同平面的问题放到同一平面讨论辨析,否则由于角度不同、所指不同,会永远争辩不清;再如《汉字构形原理与中小学汉字教学》(2001)、《字理与字理教学》(2005)、《汉字的构形原理与讲解原则》(2010)、《汉字教学的理与法》(2013)、《汉字的特点与对外汉字教学》(2014)、《汉字教育的泛文化意识》(2016)等,则是李运富将汉字学三平面理论应用于指导汉字教学,同样取得了“通”的效果。

(二)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方面

李运富对汉字理论的探讨往往结合古文字材料和出土文献来进行。他的博士论文《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1996)归纳

出近 2000 个楚文字,分别从构形理据、结构层次、组合关系和构件类别、构件功能、形体模式、功能模式等多方面进行细致分析,首次全面展示楚国文字的构形系统和构形规律,并将楚文字构形系统置于整个汉字史中进行考察,比较其与前代商周文字、同时代列国文字、后代秦汉文字的异同,从而探讨楚国文字的渊源、战国时代文字异形的实质、秦汉文字对六国文字的继承等汉字史上有争议的问题。博士论文还对 100 多个楚简帛疑难字进行新释或改释,多发前人所未发,被学界反复征引。该论文由岳麓书社 1997 年出版,苏瑞评价该书是“战国时期国别文字构形系统研究的开拓之作”,“在战国文字研究乃至整个古文字研究领域,这部书都不失为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14]

李运富《战国文字“地域特点”质疑》(1997)在学界引发震动,该文认为现有列举的各“系”文字的“地域特点”不具有整体区别性,只能算某系文字具有的现象而非某系文字独有的特点。问题主要出在研究方法上,因为这些特点是按照既有的国别地域“描述”出来的,而不是从汉字实际材料中“比较”出来的,而且描述的对象不限于文字。这种先入为主的做法得出的有关结论混淆了材料范围跟文字系统的关系、混淆了普遍现象跟独有特点的关系、混淆了综合文化属性跟文字专业属性的关系,因而即使符合事实,也难以从逻辑上让人信从。李运富指出,现在能够看到的战国文字国别之间的差异属于局部书写风格或个体字符字样的不同,从文字的本体特征和总体说,战国文字还无法整齐地按国家或地域分系。战国文字的部分成员可能存在国别地域的不同,但不应该是学者们现在表述的这个样子。董琨《楚文字若干问题的思考》(2006)认为李运富的质疑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17] 尽管李运富的质疑未必得到古文字学界主观上的普遍认同,但客观上却推动了战国文字各系材料由描述性研究转向了比较性研究,近年来关于相同词语用字方面的差异也确实比较出了一

些系别特点。

疑难字词的考释是古文字及出土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最容易主观发挥而歧异众多的。为了提高考释的有效性和可信度,避免单一考释方法的偶然性,李运富在他的博士论文(1996)和《楚国简帛文字丛考》(1996/1998)、《考释古文字应重视构形理据的分析》(1998)、《楚简“𠂔”字及相关诸字考辨》(2003)等论文中,通过考释实践,提出了“构形系统考证法”,在《论出土文本字词关系的考证与表述》(2005)中进一步提炼为“完全考释”“非完全考释”“证据链”等系列概念,认为考释古文字要有“系统证据”,要像公安局破案一样形成没有反证和缺环的“证据链”,只有在字词的“形、音、义、用”(或形体、结构、职用)各方面都能做出合理的解释说明,才算是确切无疑的“完全考释”。“非完全考释”当然也需要,但不宜作为定论。这对古文字考释摆脱猜谜射覆式的主观臆测,无疑具有学理意义。

李守奎先生曾谓“当前汉字研究被分裂为以释读古代文字为主要目的的古文字学和以理论探讨为核心的‘文字学’或‘汉字学’,……像唐兰、裘锡圭这样能够融通古文字学与汉字理论的学者很有限。当今的学术日益专门化,‘古文字学’与‘汉字学’之间的裂痕有扩大的趋势。”^[18] 李运富能够融通古文字和汉字理论的研究,应该属“有限”者之一,难能可贵。

(三) 训诂学与词汇语义学方面

训诂学与词汇语义学也是李运富长期关注的领域。他曾就传统训诂术语的内涵和逻辑关系、如何评判验证注释或训诂材料的是非优劣、汉语部分词语词义的来源、《诗经》《尚书》《论语》《孟子》《毛诗平议》中的疑难训诂问题等进行探讨,对古汉语词汇学和训诂学的区别、如何创建古汉语词汇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古汉语词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等也有独到见解。相关论文如《古汉语词汇学说略》(1988)、《古汉语词汇学与训诂学关系谈》(1989)、《从〈毛诗平议〉看训

诂中的逻辑问题(论据部分)》(1989)、《从〈毛诗平议〉看训诂中的逻辑问题(证明部分)》(1989)、《古汉语词汇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89)、《〈毛诗平议〉训诂结论的检验问题》(1990)、《〈左传〉训诂札记》(1992)、《“乐岁终身苦”新解》(1996)、《〈诗经·邶风·北风〉篇新解》(1997)、《〈诗经·豳风·九罍〉篇新解》(1997)、《〈尚书〉〈论语〉札记十则》(1998)、《中·身·年音义关系小考》(1999)、《〈孟子〉“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疑诂》(2002)、《略谈源自佛教的汉语熟语》(2008)、《“一丝不挂”源流考辨》(2009)、《宋代墓志复音词的来源》(2011)等。

这里主要介绍李运富对汉语词汇和语义系统方面的几种理论贡献。一是注意到汉语词汇发展中的“异解另构”事实,指出绝大多数复合词和成语的所谓“误解误用”现象可以做“异解另构”的合理解释,不宜因其“不符合原义原用法”就一律判作“误解误用”,从而揭示了汉语复合词产生新词新义的一条重要途径,详见《佛缘复合词语的俗解异构》(2013)、《从成语的“误解误用”看汉语词汇的发展》(2013)。二是对复合词的分类和分析方法主张从语法转向语义,指出汉语复合词的本质特征在意义变异,因而研究复合词重点应在说明复合词的词义是如何生成的,不宜纠缠语素之间的语法关系;对复合词的词素意义的确定和组合关系的分析也要排除字形束缚和语法干扰,从复合词的本义出发,联系复合词的成词理据和文化背景,进行多方面的权衡斟酌;详见《论汉语复合词意义的生成方式》(2011)、《论汉语复合词的词素意义》(2011)。三是在《论典故词的词典处理》(2012)、《论造词用典与言辞用典》(2015)中将用典区分为“造词用典”和“言辞用典”,前者属语言层面,用典结果是产生存储性的备用词汇;后者属言语层面,用典结果是形成修辞性的言语表述。文章对造词用典的方式和言辞用典的类型,以及大型工具书如何处理这两种用典的条目等作了深入论

析。四是《论汉语词汇意义系统的分析与描写》(2010)把概念场理论与语义场理论结合,把义素分析与词项属性分析结合,把义素二分与义素多分结合,把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结合,从而提出分析和描写汉语词汇意义系统的新思路。要点是:(1)从认知范畴入手,根据通常对某一概念的理解,把封闭材料中属于该概念范畴的所有词项类聚起来,建立覆盖在该概念场之上的词汇场。(2)对词汇场中的所有词项进行“二分+多分”的义素分析和义位描述,根据某一角度的共同义素系联出不同语义场。(3)对各个语义场中的词项分别进行“语义属性”“生成属性”“使用属性”的分析,比较同场中不同词项的属性差异。(4)比较不同时期同一概念场中语义子场的变化、同一语义场中词项成员和词项属性的变化,从而揭示词汇和词义演变的某些规律。这个辨析相关词项和描写词汇意义系统的新框架极具方法论意义,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有多篇博士论文运用“词项属性分析框架”研究词义系统。

(四) 语法学与修辞学方面

李运富治学是从语法开始的,前期发表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如《“之”在主谓间的作用》(1983)、《间“之”主谓结构的语法功能》(1983)、《也谈“M1之于(与)M2”》(1984)三篇是讨论文言文主谓之间用“之”的现象:主谓之间的“之”作用不在“取消句子独立性”,而在舒缓语气,以达到延伸语势、悬后下文、强调谓语、和谐音节等效果;间“之”主谓结构跟无“之”主谓结构语法功能基本相当,既能作句子的各种成分,甚至成分中的成分,又能作各类复句的各种分句,也能作独立的单句“天之于民厚矣”“今秦之与齐也犹齐之与鲁也”之类的“名+之于(与)+名”结构也是主谓结构,其中的“于(与)”保留动词属性。《试谈使动、意动用法的归属和注释问题》(1984)、《使动、意动误例辨》(1989)两文则对将使动、意动看做“词类活用”提出质疑,认为它们应该属句法问题,反映的是“主语·动词·宾语”之间的语

义关系,跟“词类活用”相关但不处在同一层面,因而注释使动、意动现象应该跟注释词类活用现象区别对待,并通过某些误判误注例句提出了分辨是否使动意动句和究竟是使动句还是意动句的方法。《〈左传〉谓语“请”字句的结构转换》(1994)认为《左传》中的谓语请字句共有8种表层结构,来源于3个深层结构,可见“请”是汉语中一个十分特殊的动词。《状语“请”字的意义分析》(1987)提出不能把状语位置的“请”都简单地看做表敬副词,根据中心义素代表义位的理论,状语“请”应该区分为表请求、表意愿、表将要、表希望、表礼敬5个义项。《〈论语〉里的“必也,P”句式》(1987)讨论的是“必也正名乎”这种句式,通常把“必也”当作副词状语理解,李文认为《论语》里的“必也,P”都是放在否定性语意之后,“必也”是对前文否定语意所做出的不得已的假设性肯定,“P”是在假设的情况下所引出的结果。因此,“必也”与“P”构成假设复句,“必也”是一个分句,后面当加逗号。李运富研究语法往往跟文献阅读结合,目的在借助语法手段解决词语训释和句意理解的疑难。

前面评介过李运富对汉语修辞学史的研究,其实在修辞学理和修辞现象的研究上也有不少成果。如与李维琦先生等合著有《古汉语同义修辞》(1989),并发表过《信息修辞略论》(1990)、《古文中的语句省略》(1990)、《省略新论》(1991/1992)、《生活中的语言困惑》(1993)、《散文名篇〈春〉修辞解析疑误二则》(2002)、《修辞同义关系的“同”与“异”》(2013)等论文。其中谈“省略”的几篇文章认为,“省略”不完全是语法现象,而是综合性的语文现象,主要是一种言语表达方式。因此应该根据语意和逻辑来判定“省略”与否,而从修辞的角度来分析省略效果。这种从修辞角度探讨省略的原因、意图和效果的做法,跟通常仅限于语法成分的省略分析比,不仅理论上更宏通,实践上也更有用。这些论文多数收入李运富《汉字汉语论稿》(2008),张素凤认为是于细微处见理

论、于细微处见功夫^[9]。

以上所述是李运富的主要学术成就,未能全面反映其学术工作和贡献。例如李运富还主编过《古代汉语教程》等多种教材,主编过《古汉语字典》等多种工具书,主编过《训诂学与词汇语义学论集》等多种论文集,甚至还创办过《励耘语言学刊》等多种学术刊物,负责过全国性学会(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工作,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访问学者、进修教师等各类专门人才已有130多名。这些虽然与李运富的学术研究相关,但并非学术思想本身,此不赘述。

三、李运富的治学特点

通过对李运富主要学术成就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李运富是位学术个性鲜明的学者,“学史求真,学理求通”是其遵循的总原则。具体来说,如下几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借鉴。

(一) 博涉多门,学识宏通,跨越不同学科

李运富常说“做学问,理论上要有学科界域,没有学科界域很多问题就说不清;但实践上不要被‘某某学’所限制,跨学科才能开阔眼界,相互借鉴。系统性、逻辑性和质疑精神是所有学科都需要的,具有这些科学素养就可以迁移打通相关学科。”李运富治学领域博涉汉字学、古文字学、训诂学、词汇语义学、修辞学、语法学、文献学等,所以观察问题视野宏阔,立意高远,能站在学术前沿,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故其立论见解往往不同凡响。如他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古今字”资料库建设及相关专题研究,以历代注列“古今字”材料为线索,全面测查这些“古今字”在不同时代文献中的实际使用情况,从历时的角度研究汉字职能变化和字符群组关系的变化,总结不同时代的用字特点,揭示汉字使用的发展规律,分析汉字职用演变的原因,从而打通训诂学、文字学、文献学,创立

了新的汉字职用学理论。

(二) 不泥陈说,质疑问难,富有批判精神

张载《经学理窟·义理》云“于无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学术的进步需要新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汉字学新论》这本书是出版社定名的,李运富自己原想叫“瞽论”,《后记》中解释说“‘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就是不顾君子老爷的态度或表情,自顾自地说。我这部书也多半是自己说自己的话,没有顾及他人是臧还是否,所以命之曰‘瞽论’。唯其‘瞽’,也就难以抄袭;唯其‘瞽’,也就言为心声。”诚如所言,李运富治学的另一鲜明特点就在于不固陈说,不惧权威,不人云亦云,而是善于发疑设问,常能于无疑处有疑,敏锐地发现习焉不察的问题,甚至对学术界几乎形成共识的概念和理论进行大胆批判,进而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样的材料解读出新的观点,述说己见从不隐瞒也不保守,这不仅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学术眼光,更需要傲然世外的勇气和魄力。无论是对学术史上的“联绵字”“连语”“古今字”“六书”“分别文”“连类而及”“并言”等概念进行追源讨流,还是挑战“战国文字‘地域特点’”“汉字形音义三要素”“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等说法,抑或对“形声相益”“蹴尔而与之”等作出新的解释,李运富都是从近乎定论的命题中提出疑问,经过全面勾稽爬梳原始材料,抽丝剥茧,环环紧扣地展开逻辑演绎,得出自己的新结论。

(三) 重视理论,讲究系统,追求中国特色

李运富一贯重视汉语言文字学的理论建构,追求学术研究的体系化和科学化,主张用理论统率材料,用理论解释现象。并认为理论都是人为建构的,是主观的;一种理论好不好,主要看它的各种概念通不通,各种类别成不成体系,能否描写并解释范围内的全部事实或大部分现象。类系通达、解释力强的理论就是有用的好理论。他提出的汉字学三平面理论、汉字职用学理论、词项属性分析框架

理论、复合词的意义生成方式理论等,都是概念清晰、体系严密的,不仅能有效描写和解释汉字、汉语词汇词义本身的各种事实现象,在相关的古籍整理、字典编纂修订、汉字教学与规范、少数民族文字整理与研究等领域也有应用和参考价值。而且李运富不是运用西方理论解释汉语言文字现象,也不是以汉语言文字现象去验证西方理论,而是从汉字汉语的实际出发,尝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文字理论体系,这种学术追求是值得赞赏的。

(四) 分辨异同,严谨推论,遵循逻辑规则

李运富说“逻辑是一种抽象化了的形式,对任何科学都适用,当它注入一定内容时,就必须跟这内容的实际相符合。所以形式逻辑应该要求它的每一个结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只有被实践检验通过了的结论,才能算是正确可行的结论。”(《汉字文化》1990.2) 早年他曾发表《从〈毛诗平议〉看训诂中的逻辑问题》(证据部分)、《从〈毛诗平议〉看训诂中的逻辑问题》(证明部分)、《〈毛诗平议〉训诂结论的检验问题》等论文,指出前人训诂实践中存在“违反同一律、以相对为绝对、循环论证、机械类比、硬相传递”等逻辑问题,因而有关结论难以信从。汪少华《训诂论证的有效与结论的可靠》(2010) 对此给予充分肯定。逻辑思维的重要不只体现于训诂,在文字学研究中,李运富提出区分三个平面,强调将具体研究对象置于各自适应的平面中分别考察,避免把不同系统的问题纠缠一起,因为立场不同、角度不同、概念所指不同的辩论是无效的。所以李运富特别注意讨论问题时先辨明概念,不做牛头不对马嘴的无谓争议。如讨论汉字性质问题时区别形体属性、结构属性和职用属性,讨论字际关系问题时区别“文字系统(构形系统)”和“文献系统(职用系统)”,讨论汉字起源问题时先界定什么是“字”,是“字”的什么“源”,进而区分“源出”(源创者、源处、源素、源体、源式)“源头”和“源流”,讨论结构分类时先界定什么是“体”,然后才能分清

什么是“独体”什么是“合体”，讨论汉字发展演变时也从形体、结构、职用三方面分别说明，凡此等等，明确概念所指，分别类系所属，用严谨的逻辑规则化解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议。

(五) 全面观察，辨证表述，力避偏颇绝对

以偏概全，绝对表述，是学术研究中常见的毛病。例如关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通常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记录语言是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所以文字是语言的翻版，文字符号只有转换为对应的语言符号才能表达意义，由此形成汉字“工具论”。李运富认为这些观点失之绝对，实际上自源文字与他源文字相对于语言的关系是不同的。汉字属于自源文字，起源阶段的汉字取形于客观事物，直接表现客观事物，其功用在记物记事而不在记录汉语；在跟汉语结合的过程中，汉字也不能一开始就完整记录汉语；即使在汉字体系完整以后，汉字记录汉语也是重在语义而模糊语音的。而且汉字在记录汉语的同时，还能够表达超语符信息：以字符的构件表示某些跟字符所记语符不对应的信息，以字符的外形表示非对应语符的信息，以变异的字形表示对应语符之外的信息等。所以汉字并非汉语的翻版，不只是记录汉语的工具这么简单；汉字应该是跟汉语功能互补的另一套符号，不仅可以独立表达信息，还可以影响汉语音义的发展演变。这些看法在李运富《汉字学新论》(2012)、《论汉字的超语符功能》(2014)、《汉字教育的泛文化意识》(2016)等论著和一些学术演讲(如2017年4月湖南师范大学“至善讲堂”所讲《汉字的符号性漫谈》)中都有提到。

参考文献

- [1] 沈怀兴. 联绵字理论问题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2] 沈怀兴. 现代联绵字理论负面影响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3] 袁晖. 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 [M]. 太原: 书海出版社, 2002.
- [4] 宗廷虎. 20 世纪中国修辞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 [5] 王希杰. 中国当代修辞学的现状和未来 [J]. 扬州大学学报, 2008(6).
- [6] 郭焰坤. 一部独具特色的现代修辞学史——评《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J]. 修辞学习, 1993(5).
- [7] 周守晋. 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与修辞学的二十世纪——读《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J]. 汉字文化, 1993(4).
- [8] 赵家栋. 浅议《汉字学新论》之“新”[A]. 中国文字研究(总第23辑) [C].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6.
- [9] 张道升. 论李运富对汉字学理论的贡献 [J]. 求索, 2012(9).
- [10] 郭敬燕. 汉字研究从“形音义”到“形意用”——读李运富《汉字学新论》[J]. 语文知识, 2013(4).
- [11] 付海燕. 汉字结构类型新论——读李运富《汉字学新论》[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 2015(5).
- [12] 赵一夫. 读《汉字学新论》，谈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J]. 读天下, 2016(24).
- [13] 何余华. 汉字“形构用”三平面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J]. 语文研究, 2016(2).
- [14] 陈斯鹏. 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15] 陈灿. “字用学”的建构和汉字学本体研究的三个“平面”——读李运富先生《汉字汉语论稿》[J]. 语文知识, 2008(4).
- [16] 苏瑞. 战国时期国别文字构形系统研究的开拓之作——读李运富《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A]. 简帛研究(第3辑) [C].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8.
- [17] 董琨. 楚文字若干问题的思考 [A]. 古文字研究(第26辑) [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18] 李守奎. 面向全球的汉字学——关于汉字研究融入国际学术体系的思考 [J]. 吉林大学学报, 2012(2).
- [19] 张素凤. 内容丰富、观点新颖、学理与学史并重——李运富先生《汉字汉语论稿》述要 [A]. 励耘学刊(语言卷)(第7辑) [C].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王 崇】